
绿色发展的中国经验及未来展望

沈满洪¹

【摘要】 绿色发展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黑色增长范式的变革。深绿色发展是绿色发展的高级形态。当前,中国已进入生态环境安全等低层次需要与生态环境审美、生态环境民主等高层次需要并存,以及浅绿色发展与深绿色发展并存的阶段。浙江省绿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以浙江省绿色发展为代表的中国经验主要包括: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接力棒”精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优先论;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惠民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论;坚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的生态治理论。面向未来,深入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生态文化普及化、生态产业主导化、生态消费时尚化、生态资源经济化、生态环境景观化、生态城乡特色化、生态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等战略。

【关键词】 “两山”理念 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 生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0)04-0020-007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绿色发展理念凝聚了我们党这些年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绿色发展不仅成为我国的发展方向,也成为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成为引领世界的时代潮流。本文以绿色发展的核心概念阐释作为铺垫,着重就我国绿色发展的阶段判断、绿色发展的中国经验及绿色发展的未来趋势作一阐述。

一、绿色发展的基本概念

(一)绿色发展与黑色增长

绿色发展是对工业革命以来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为代价的黑色增长范式的变革。在指导思想,黑色增长观认为,要征服自然、驾驭自然、改造自然,主张“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驾驭自然,做自然的主人”;绿色发展观则认为,要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敬畏自然,“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¹在方法论上,黑色增长观认为,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经济系统无限膨胀;绿色发展观则认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要考虑环境容量、自然承载力。²在发展模式上,黑色增长是以成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生态大破坏为代价获得经济高产出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是成本低或适度投入、资源低消耗、污染低或无排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因此,绿色发展是对黑色增长的扬弃:“抛弃”的是“黑色”,反对超越极限的增长;“发扬”的是“增长”,反对“零增长”。

(二)深绿色发展与浅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可以分成浅绿色发展和深绿色发展。³从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看,浅绿色发展观是就环境论环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水利不上岸,环保不下河”;深绿色发展观强调整体性思维和系统论观点,新发展理念就是体现系统论思维的深绿色发展

¹**作者简介**: 沈满洪,经济学博士,宁波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院长、宁波大学长三角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进区域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体系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编号:19AZD004)。

观。从末端和源头的关系看,浅绿色发展观属于末端治理理论,是基于“生产—污染—治理”的线性经济思维的环境治理;深绿色发展观属于源头控制论,是基于“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循环经济思维的环境治理。从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看,浅绿色发展观认为环境与经济是对立的,经济增长必然影响环境保护,保护环境必须限制经济增长,如“增长极限论”等;深绿色发展观认为环境与经济是对立统一的,保护环境有利于更好发展,更好发展有利于环境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念就突破了非此即彼观。从技术和制度的关系看,浅绿色发展观往往强调技术万能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深绿色发展观认为技术是重要的,但制度也是重要的,甚至比技术更重要,所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份量最重的是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总之,深绿色发展是浅绿色发展的高级形态。

(三) 绿色发展与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绿色发展”与“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是什么关系?从侧重角度看,“绿色发展”针对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旨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循环发展”针对资源危机,旨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低碳发展”针对气候危机和能源危机,旨在建设气候舒适型社会。因此,这三个概念可以并列,如“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表述就是从各有侧重角度阐述的。从含义广狭角度看,三个概念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绿色发展”含义最广,“循环发展”其次,“低碳发展”最窄。“绿色发展”既要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又要求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循环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减量化、再使用和再资源化,这三个原则也正是“绿色发展”所追求的。“低碳发展”针对碳减排和碳循环利用,仅仅是循环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包容关系阐述绿色发展,把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的相关内容纳入其中。这样,既解决了多个概念难以分辨的问题,又避免了几个概念之间逻辑上的可能歧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等均延续了“绿色发展”的提法。

二、我国绿色发展的阶段判断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思想在发展领域的集中概括。生态文明是名词,绿色发展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生态文明的含义更加宽泛,绿色发展的含义更加聚焦;生态文明从文明高度进行抽象,绿色发展从发展角度进行阐释。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与此同时也提出了绿色发展,迄今已经十多年。那么,中国绿色发展到达什么阶段了呢?在此,笔者试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 从微笑曲线看绿色发展所处的阶段

图 1 中,横轴反映了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品牌、营销”的企业生产的全过程,纵轴反映的是利润率。研发、设计环节,由于专利制度的保护,往往拥有高利润率。500 年前专利制度的发明,大大激发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发明家的积极性,并催生了近代科技革命。品牌、营销环节,由于商标权的保护、营销网络的构建也拥有高利润率。吉利汽车并购沃尔沃,上百亿的代价购买,短短几年时间就收回成本,就是因为利用了沃尔沃现成的全球营销网络。生产、制造环节的利润率是最低的。20 世纪 90 年代末,桐庐县分水镇的圆珠笔产能可以做到全世界每人每年发一支,但一支圆珠笔只卖 1 角钱甚至 8 分钱,生产销售一支圆珠笔只挣 1 分钱甚至半分钱。到现在为止,中国总体上还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因此,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品牌、营销”,利润率先是不断下降,然后是不不断上升,在图 1 中表现为一条 U 字形的曲线。加上一双“眼睛”,就像微笑的样子,因此,称作微笑曲线。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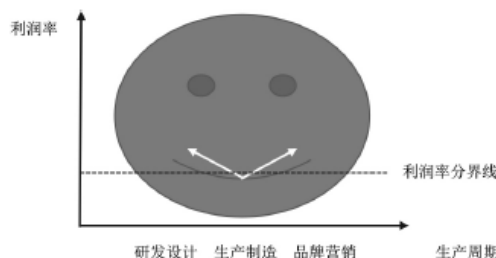


图 1 从微笑曲线看绿色发展所处的阶段

中美两国比较来看,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专门赚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的高利润率的“大钱”;中国主要赚生产、制造的低利润率的“小钱”。2006年,我国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科技大会,首次提出自主创新战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要有核心竞争力必须要有核心技术。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把核心技术卖给人家,往往只有在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后,才会把淘汰了的技术卖给人家。因此,中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以来,中国的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5年的45%提升到2018年的58.5%。可见,中国正处于从微笑曲线的底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的阶段。不过,与发达国家高达80%以上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相比,我国仍有很大差距。因此,一方面,要看到中国还落后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要看到中国总有一天可以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微笑曲线角度考察,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从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端延伸,既要依靠生产、制造环节实现高就业率,又要依靠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获取高利润率。

(二)从资源依赖性倒U形曲线看绿色发展所处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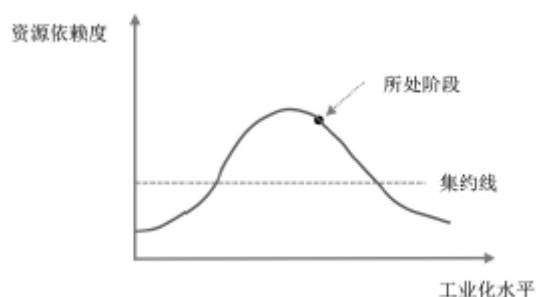


图 2 从资源依赖性倒 U 形曲线看绿色发展所处的阶段

图 2 中,横轴反映的是工业化水平,纵轴反映的是资源依赖度。资源依赖度可以用每年人均某一种自然资源的消耗量表示,如每年人均石油的消耗量、煤炭的消耗量、水资源的消耗量等。水平的虚线粗略表示集约线,该线以上表示粗放式增长,该线以下表示集约式增长。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国家、相当一部分自然资源经历过这样的倒 U 形轨迹,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源依赖度先是按照递增的速度递增,然后是按照递减的速度递增,到达顶点时大约进入工业化中期,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中后期转型的过程中,资源依赖度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而不是自然资源的投入。

中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资源依赖度不断提高,直到 2015 年左右资源依赖度才开始下降,其中,浙江省等长三角地区下降得更加明显。图 2 的圆点表示中国资源依赖度目前所处的位置。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已经完成了资源依赖性倒 U 形曲线的逆转,从上升转为下降,说明绿色发展的趋势已经呈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第二,中国仍然处于粗放式发展的阶段,资源依赖度尚未到达集约线以下,资源生产率依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因此,我们绝不能够满足于现状,还要强力推进绿色发展。

(三)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看绿色发展所处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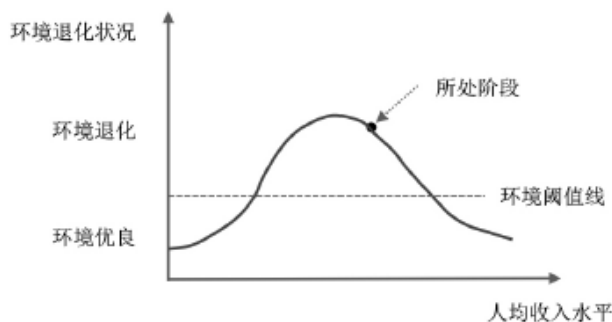


图3 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看绿色发展所处的阶段

图3中，横轴反映的是人均收入水平，纵轴反映的是环境退化的状况，比如说某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中重度污染、严重污染的天数在一年中的比重，地表水中V类水体与劣V类水体河段占有河段的比重等。水平线表示环境阈值线，在该线以上表示，污染排放超过环境阈值，人与自然是和谐的，环境质量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该线以下表示污染排放处于环境阈值范围之内，人与自然是和谐的，环境质量已经令人满意。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过倒U形的轨迹，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环境质量先是不断退化的，退化到某个顶点，老百姓忍无可忍，于是各种环保主义运动兴起，迫使政府想方设法治理环境，经过短则三五十年的治理如日本，长则一两百年的治理如英国，才实现环境质量的好转。

中国在工业化加快推进的数十年时间里，随着经济持续增长，环境质量总体上在不断退化。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采取强硬的态度和强力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终于在2015年左右环境质量开始好转，其中浙江省等长三角地区实现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由此，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中国跨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顶端，实现了逆转，开始了好转，浙江省等长三角地区则实现了显著好转。这是来之不易的成就。第二，中国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仍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还处于环境污染超过环境阈值的范围，需要继续加大治理力度。因此，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的绿色发展成就巨大，绿色发展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绿色发展的战略越来越清晰明了，绿色发展的制度越来越落到实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可以用三对矛盾来概括：经济持续增长与环境形势严峻、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经济总量扩张与资源有限供给、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生态需求与政府不尽理想的优质生态供给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

从生态环境安全需要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一口水”“一口气”“一口饭”的基本问题。这些都是“污染防治攻坚战”所要解决的低层次需要。但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人们对生态环境审美的需要、生态环境民主的需要、生态环境协商的需要、优质生产产品的需要等高层次需要日益增长。因此，现在既是高层次需要和低层次需要同时并存的特殊阶段，也是浅绿色发展与深绿色发展同时并存的阶段。在这样的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和压力一点都没有减轻。

三、绿色发展的中国经验——以浙江省为例

浙江省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萌发地，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率先践行地。正因为如此，浙江省绿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省绿色发展的理念、举措和经验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浙江经验”就是“中国经验”。

(一)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接力棒”精神

浙江省的绿色发展经历了下列多个阶段：绿色浙江建设→生态省建设→生态浙江建设→美丽浙江建设→诗画浙江建设。这些不同的战略表述均是不同时期浙江绿色发展的集中概括。这些战略目标，一方面坚持绿色主线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坚持绿色程度不断深化。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党委政府的一个可贵精神就是以“咬住青山不放松”“一任接着一任干”“功成不必

在我”的“接力棒”精神,把“一张蓝图绘到底”,描绘出如诗如画的浙江“大花园”。浙江省之所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杭州市之所以成为美丽中国的样本,安吉县之所以成为全国第一个生态县,靠的就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接力棒”精神和锲而不舍、常抓不懈的韧劲。

(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优先论

浙江的资源禀赋是“七山一水两分地”。“地域小省”“资源小省”“环境容量小省”的省情加上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导致率先遭遇“成长中的烦恼”。2005年,浙江省接连发生了“东阳画水事件”“嵊州新昌事件”“长兴天能事件”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何看待这些事件?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⁶,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在生态优先观的指导下,如今的东阳市已经成为“歌山画水”的金名片,如今的新昌县已经成为全国科技创新示范县,如今长兴县已经成为新能源基地。可以说,浙江省的产业生态化已经基本完成了脱胎换骨。实践证明:浙江只能生态优先,浙江能够生态优先。

(三)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断在浙江率先提出,也在浙江率先实践。绿色发展就是要做到“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浙江省在经济绿色化方面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浙江省不遗余力推进存量经济和传统产业的快速改造,大力推进传统重化工业的“清洁化生产”和“循环化发展”,大幅度提高了“资源生产率”和“环境生产率”,例如,宁波市“镇海炼化”等的绿色化和“吉利汽车”等的智能化生产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浙江省不遗余力推进增量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做到产业发展的“高新化”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轻型化”即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依靠脑袋就能赚钱的新经济增长出现两位数的高增长,例如,现在杭州市的数字经济已经领跑全国。

(四)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惠民论

在党的十八大结束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⁷浙江省坚定不移执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国策:一方面,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一水”“一口气”“一口饭”等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需要,通过“五水共治”“五气共治”等一系列“组合拳”实现生态环境状况的显著好转;另一方面,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生态环境审美”“生态环境权益”“生态环境民主”等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层次需要,通过“四边三化”“诗画浙江”“环境协商”等“组合拳”将全省域打造成为“大花园”。

(五)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论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论断,浙江省自觉地付诸行动:从总系统与子系统的角度看,浙江省坚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以生态经济发展为主线、以生态文化建设为保障的全面发展战略;从城乡空间布局的角度看,浙江省先后以“生态省”和“美丽浙江”作为总的牵引,大力实施“生态市”“美丽城市”、“生态镇”“美丽城镇”、“生态村”“美丽乡村”等特色鲜明的层级分明的生态化建设;从系统运行角度看,浙江省十分重视目标体系即适时调整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工作体系即“千万工程”“五水共治”等抓手、保障体系即组织资金政策等保障、考核体系即在考核基础上的奖优罚劣等激励。

(六)坚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的生态治理论

笔者曾经就水制度建设对全国政府公务网做了拉网式的普查,发现浙江省的水制度是全国最健全的⁸。浙江省最早探索水权交易制度,最早探索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最早探索水生态补偿制度。迄今为止,浙江省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总量控制制度、生态红线制度、终身追责制度等别无选择的强制性制度;绿色财税制度、绿色产权制度等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生态道德教育、舆论绿色引导、绿色社团建设等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浙江省的绿色发展制度体系是全国最为完整的,也是运行最为有效的,其中原因就是坚持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观点。绿色发展中浙江省实现了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治理、从功能混乱转向职能明确、从单打独斗转向协同作战。

四、绿色发展的未来趋势

生态文明建设的构成要素包括生态文化、生态产业、生态消费、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生态科技、生态制度,这些要素放到空间当中就是生态城乡。因此,笔者围绕这些要素提出绿色发展八个方面的战略趋势展望。

(一)实施生态文化普及化战略,让生态价值、生态道德、生态习俗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

这里的核心在于“普及化”,具体地说就是:要树立生态生命观。“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⁹要树立生态价值观。生态是有生命的,生态是有价值的,生态价值是可以转化的。要树立生态道德观。伦理道德不仅要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当代人之间和代际之间),也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树立生态文化观。努力做到以文化人,形成生态自觉、生态自律、生态习俗。

(二)实施生态产业主导化战略,让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成为生产活动的主旋律

这里的核心在于“主导化”。“生态产业主导化”的要求远远高于“产业生态化”的要求。后者只要有,前者要求足够多。为此,要大力倡导绿色发展,遏制黑色发展;倡导循环发展,遏制线性发展;倡导低碳发展,遏制高碳发展。从途径上讲,存量经济与传统产业要走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之路(循环化、清洁化),例如,浙江的镇海石化、绍兴印染等已经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增量经济与新兴产业要走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之路(高新化、轻型化),例如,绍兴新昌、湖州长兴、金华东阳等就是转型升级的成功典范。

(三)实施生态消费时尚化,让绿色消费、循环消费、低碳消费成为社会的风尚

消费行为对绿色发展影响重大。消费行为直接影响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而且具有传导性。消费者用货币购买商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投票”的过程。用货币购买绿色产品或用绿色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就是支持绿色发展;用货币购买黑色产品或用黑色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就是抵制绿色发展。因此要高度重视“货币选票”的作用。要改变摆阔式消费,推崇适度性消费;改变破坏性消费,推崇保护性消费;改变奢侈性消费,推崇节约型消费;改变一次性消费,推崇重复性消费。要加强消费主体的教化,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

(四)实施生态资源经济化战略,通过价格显示做到自然资源、环境资源、气候资源价值的实现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生态科技创新和生态制度创新,提高自然资源生产率,加强自然资源需求侧管理,优化自然资源投入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基于庇古理论¹⁰的资源税、环境税、碳税及生态补偿、循环补助、低碳补贴等制度改革;推动基于科斯理论¹¹的用水权、排污权、用能权、碳权制度等制度改革。

(五)实施生态环境景观化战略,让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生产环境满足审美感受

正是基于人们对美的需要的快速上升,浙江省主动提出了全省打造成一个大花园的构想,每个市县镇就是大花园的一个组成

部分,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处处有美景。但是,“大花园”的打造还不充分、不平衡。因此,绿色发展的推进要从普通环境转向优美环境,从普通产品转向生态产品。既要打造优美的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美,又要打造优美的生活环境——生态人居美,还要打造优美的生产环境——生态经济美。为此,要以规划为引领,以设计为核心,以养护为保障。

(六)实施生态城乡特色化战略,形成城市—城镇—村落及城市、城镇、村落差异化和特色化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既要让城市依托现有山水脉络,使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施生态城乡特色化战略的目标有两个:一方面,要做到城市与城镇之间、城镇与村落之间、村落与城市之间有足够的差异度,且尽可能有隔离带;另一方面,城市与城市之间、城镇与城镇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有足够的差异度,防止“千城一面”“千镇一面”“千村一面”的现象。差异就是特色,特色就是优势。为此,要推进城乡多规合一,城乡统筹,明确定位,彰显特色。

(七)实施绿色科技自主化战略,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自主创新是引领绿色发展的第一动力。在绿色且经济、循环且经济、低碳且经济的情况下,只要推广和鼓励即可。但是,在绿色不经济、循环不经济、低碳不经济的情况下怎么办?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从绿色不经济转向绿色经济,从循环不经济转向循环经济,从低碳不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创新引领是永无止境、不可估量的。例如,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2010年约1.0—1.1元/度,2013年约0.7—0.8元/度,2018年则降到0.39元/度。当新能源的价格与旧能源的价格相当的时候就是新能源替代旧能源的时候。而且,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要更加重视绿色科技的自主创新。要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

(八)实施生态制度体系化战略,形成完善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和制度,全面实现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

生态文明制度在推进绿色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生态文明制度可以细分为体制、机制和制度。体制层面比较宏观,机制层面属于中观,制度层面比较微观。因此,需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制度建设同频共振。就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特别需要加强体系化建设,做到别无选择的强制性制度、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和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的体系化,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的体系化,源头性制度、过程性制度和末端性制度的体系化。有了生态文明制度的保障,就可以推进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就要做到:从单中心管理转向多中心治理,从一刀切管理转向多元化治理,从碎片化管理转向系统性治理。总之,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页。

2 [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诸大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3 [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诸大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4 沈满洪:《“绿色发展”及相关概念辨析》,《文汇报》,2017年6月9日第W15版。

5 吕乃基、兰霞:《微笑曲线的知识论释义》,《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6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89 页。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7 页。

8 沈满洪、谢慧明、李玉文等：《中国水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3-191 页。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版，第 24、50 页。

10[英]庇古：《福利经济学》，金镛译，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5-157 页。

11[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8 页。